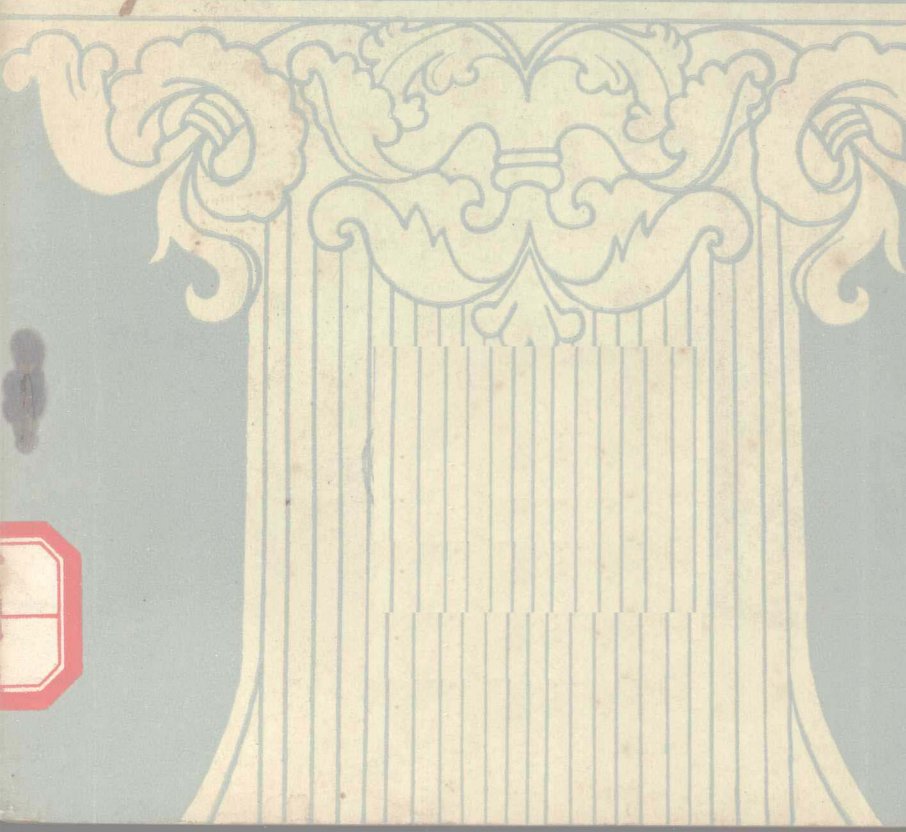




唱贊歌的时代

CHANGZANGE DI SHIDAI

王西彦 著



唱 贊 歌 的 时 代

王 西 彥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文艺論文集，按照內容性質，分成五輯：有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有駁斥反动的文艺理論的，有讀書札記，有作品評介。它所討論到的，有歌頌和暴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写真实、文学遺產、风格、批評等問題。

这些文章，都是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則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立論的。

唱 贊 歌 的 时 代

王 西 彦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湖南道6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320×110毫米1/32 印张6 9/16 字数150,000
1954年11月第1版 195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目 次

唱贊歌的时代.....	(1)
真实和真理.....	(12)
时代和风格.....	(26)
从提高作品的思想性談到批評家的任务.....	(31)
关于文学遗产.....	(40)
从苏联文艺問題所得到的启示.....	(50)
讀爱倫堡“談作家的工作”札記.....	(64)
主潮在哪里.....	(88)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上的两个問題.....	(106)
苏联文学的“客观存在”.....	(117)
被摧毁了的“理論”.....	(130)
更高地举起思想斗争的旗帜.....	(151)
基調和主流.....	(154)
在紀念魯迅的时候.....	(159)
在罗曼·罗兰的外衣下.....	(162)
“灵魂的建筑师”和“社会的守望犬”.....	(178)
一面水晶鏡子.....	(183)
青春的花朵.....	(194)

唱 贊 歌 的 時 代

在一个社会从旧到新的过渡期，文学作品里所表现的，不外是給那将死的旧社会唱挽歌，和給那方生的新社会唱贊歌。这种情形，我們可以从产生于历史上每一个新旧社会的过渡期的文学作品里，寻找到很好的例証。

在挽歌里面，包含着对将死的旧社会否定的意味。旧社会将死了，歌手們給它唱一个凄凉的送葬曲，这一方面自然是否定了它，另一方面也能使人对那方生的新社会增加信心和希望。所以，我們說，挽歌也有它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一个社会的过渡期，在将死方生之間，因为那些属于旧社会的作家对自己所屬的社会抱有一种“夕阳无限好”的心情，所以，挽歌的凄切哀怨的調子，往往格外富于感动人的力量。即将死亡的，它是一去不复返了，对那些属于旧社会的人們來說，“近黄昏”的夕阳，总是能够吸引他們最后的凝視的；虽然这种凝視，給他們带来的，仍是对于旧事物的必死的深信，因为給将死的旧社会所唱的挽歌，总是带着暴露性的——它暴露了旧社会腐敗墮落的現象，給讀者指明了旧社会的死亡的必然性。

挽歌对将死的旧社会的暴露，自然包含着对旧社会的否定精

神。这种暴露和否定，就是挽歌的积极性。

二

不过，挽歌的积极性，是有它一定的限制的。

属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一般地都是些挽歌的歌唱者。他们真实而精细地描绘了自己所属的社会生活的黑暗，准确而无情地剥扯着虚伪的统治阶级用来掩饰现实的丑恶的脸罩，使读者得到这样的结论：“呵！这样的社会是不容许继续的，它是快要死亡了！”由于这种灌输给读者的否定的精神，由于这种作品对现实社会严厉的批判的态度，所以，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就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

在一九三四年所举行的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尔基作了一篇题为“苏联的文学”的异常精辟的报告，里面有一段关于“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的话：

批判的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之无目的，于是把这种无目的只是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一切历史过程之无意义。

接着，高尔基又说：

我们决不否认批判的现实主义之广泛而又巨大的工作，我们高度地重视它在文字描绘艺术上的形式上的成就，同时我们应当了解：我们之需要这种现实主义，仅只为了阐明过去的残余，为了跟这些残余作斗争，扑灭它们。

高尔基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是说明旧社会的发展和瓦解的过程的文献，是自己所属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所以，他把

现实主义作家，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浪子”。在另一个地方，在“和青年們的談話”一文里，高尔基說：

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除揭发社会的恶習，描写家族傳統、宗教教条和法律压制下的个人的“生活和冒險”外，它不能給人們指出一条出路。它很容易就安于现状了，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是无意义的以外，它沒有肯定任何事物。

是的，挽歌的歌唱者，旧现实主义的作家們，他們对旧社会作了否定的宣布，这种宣布虽然也同时含有对新社会将临的預示，但那将临的新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应该怎样使所向往憧憬的成为现实？——在这一点上，他們就显出异常的无力了。因为，他們自身是属于旧社会的人，由于所站的社会角度的限制，不能高瞻远瞩，所以也就看不到新世界的远景。旧现实主义的作家們，不論是巴尔扎克、狄更司、果戈里、或是托尔斯泰，他們，只是所屬社会生活的偉大而卓异的批判家，只看到环绕自己的一切旧事物的腐敗和丑恶，而不能进一步地看到正在生长和发展的新事物。人类应该有另一种新的生活，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但是，这种新生活有什么内容？新道路究竟在哪里？他們之中的有一些人，对于这样的問題，采取逃避的办法；最好的，也只能用一种隱晦的暗示和空想的形象来满足自己。例如果戈里，他在他偉大的杰作“死魂灵”里，描繪和嘲弄了废料似的可笑可怜的“旧式的地主”，以及貪饒卑污的出身于破落戶的官僚之后，也就是說，在对已經沒落的旧社会作了批判和唱了挽歌之后，他預告着俄罗斯的“飞跑”，預告着“所有別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俄罗斯）退避，閃在一边，讓給你道路”。这虽然不失为“偉大的預言”，不过究竟只是一种空洞的祝福。“果戈理之所以不能成为一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作

家，乃是由于当时沒有社会主义的环境。”这也是高尔基所說的話。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新的环境里，作家們才能享有深刻而客观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远大前途的可能和机会。而旧现实主义的作家們，他們根生在旧社会的土壤里，他們的思想自然要受旧社会的限制——即使是他們那种对旧社会的批判否定的精神，也不能完全突破这种限制。这可以說是挽歌和它的歌唱者的宿命。

所以，在承認挽歌的积极性的同时，我們必須承認这种积极性所受的严重的限制。

三

而且，旧现实主义的作家們，还有另一方面更深重的不幸，那就是，在他們灵魂上，負載着过重的旧社会的腐敗的东西。

最好的例子，可以举出杜思妥也夫斯基。

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高尔基严峻地指出，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中的人物，乃是一种由旧社会的非人道的条件所产生的社会墮落者。高尔基接着說：

人們硬說杜思妥也夫斯基是真理底追求者。如果他真的追求了的話，——那末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找到了它并不是为着駁斥，而是为着辯护。是的，人的动物的本能是不会消灭的，当资产階級社会里还存在着大量激发人的兽性的影响的时候。家猫玩弄被捉着了的老鼠，是因为这个捕捉小而敏捷的动物的野兽的筋肉要求这样作，这个玩弄乃是身体的鍛炼。法西斯用脚踢工人底下顎，把头从脊柱上踢落下来——这已經不是野兽，而是一种比野兽更坏得无比的东西，这是一种應該加以消灭的疯狂的动物，这是一种像那剝去紅軍士兵皮膚上的紋章和星章的白党軍官一样的极端凶惡的动物。

杜思妥也夫斯基究竟寻求的是什麼，这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在晚

年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有才能和最誠实的俄国人維薩里昂·別林斯基乃是“俄国生活中最骯髒、最愚鈍、和最可耻的現象”，必須夺取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农奴制度可以促进“地主和农民的理想的道德关系”。最后他承认康斯坦丁·包必达諾士切夫（反动的农奴主的代表，亚历山大第三的寵臣），十九世紀初俄国生活中最可怖的一个人物，是他的“导师”。杜思妥也夫斯基底天才才是无可辯駁的，就描繪的能力讲来，他的才能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世界和人們的裁判者”，他就很容易被認作是中世紀的宗教审判官。

天才的描繪者杜思妥也夫斯基，他在自己的周圍看到了怯懦的活动在罪恶的深淵而不知自拔的人群，他把他們写成絕望的、宿命的人。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眼睛里，人是魚，而罪恶和痛苦則是水——魚必須生活在水里，人也必須生活在罪恶和痛苦里，所以，他贊美了人类的屈从和忍受的天性。人，是被損害和被侮辱的；他們痛苦、犯罪、流泪哭泣，然而，用什么来拯救自己呢？——屈从和忍受。生命是无穷期的悲劇，酗酒和墮落，杀人和自杀，无法冲破那宿命的罗網。对于自己所屬的社会，杜思妥也夫斯基自然有着强烈的憎恶，他所唱的，是一种憂郁的絕望的調子。他对旧社会旧生活作了无情的否定，可是，他肯定什么呢？他什么也不再肯定——除了那本来是自己所否定的。

必須有所肯定，你的否定才有意义。

我認为消极的角色是不值得文学去描写的。俗話說：“自己臉歪，倒怪鏡子不平。”我認为“臉歪”并不是人們所願意的，而是由于生活中存在着某种使一切人和一切事物变成畸形的力量。因此，必須“反映”这种力量，而不是反映被它歪曲了的臉孔。

这也是高尔基在“談技术”一文中所說的話。高尔基認为，人类的痛苦和罪恶，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作家不應該把入

类的痛苦和罪恶看作宿命，打破这种宿命，就是社会制度的改造。而屈从和忍受的說教，正是肯定了你所否定的。在这一点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存在着一个可悲的致命的弱点。杜思妥也夫斯基暴露了旧社会的丑恶，描繪了生活在旧社会的丑恶里面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但是，他并没有給这些不幸的人们指明一条正确的自拔的道路，正相反，他把他們引导到一条死巷里去。杜思妥也夫斯基虽然在自己的作品里写出了可悲的性格，却没有指明造成这种可悲的性格的社会条件；同时，对于出现在自己作品中的不幸者，也没有指明他們正确的前途。这些不幸者，在遭遇了种种不幸的打击和虐待之后，难道是完全絕望的吗？难道他們只有从容忍才能到达灵魂的高潔吗？——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宿命主义，完全不給他的人物以一点生命的微光。

为什么要給旧社会唱挽歌呢？自然是为了它将死了，新的社会将要出生。即使不能指明那新生社会的清晰的面目，不能指明人們怎样才能使所憧憬的成为现实，但有了憧憬，也就有了希望。作为一个挽歌的歌唱者，杜思妥也夫斯基那种凄厉的声音，却不仅只能使人感到顫栗，而且更将使人陷入无救的深淵。

四

然而，人类是必須从深淵中自拔的，屈从和忍受决不是宿命。

人类是自己的命运的主宰，他們能够战胜那不人道的社会制度，击破它，改造它，給自己創造出一个灿烂的明天。这是人类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們生活在一个根本破坏旧生活的时代，在一个激发人的自尊心的时代，在一个使人認識自己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的时代。

在上面曾經抄引过的报告里，高尔基指出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缺点之后，这样号召着作家們。社会改造的理想，孕育于人类对所属社会的憎恶不满。一个作家，当他在批判和否定自己的社会生活时，也必然地倾向于那社会改造的理想，即使是怎样的蒙眛，甚至流于空想。因为，这是他对这个他所憎恶不满的社会所应負的责任，他必須認識它，承認它，尤其是認真地担負起来。这种努力，鼓励人們改造社会的热情，提高人們改造社会的觉醒，自然也就推动改造社会的实践。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随着改造工作的不断胜利，人們的生活意志日趋坚定了，自尊心也逐渐培养起来——在这样的时候，給旧社会送葬的挽歌的声音微弱下去了，替代它的，就是一种新的歌，新的調子。

远在一九〇八年，高尔基就曾經这样激情地預告了：

世界生活的速度更加快起来了，因为青春的觉醒的强有力的惊慌，越来越深刻的滲入了生活的地心里，到处都感觉到叛逆的震动——內在的精力認識了自己的創造的能力，而在准备着行动了。慢慢地，然而准确地，在民众之中生長着自我認識，社会正义的太陽在燃燒着，而在将来的青春的呼吸之中，很显然地，融化着伪善和偏見的冷酷的外壳，无情地暴露着現代社会的畸形的骨骼——人类精神的監獄。几百万隻眼睛燃燒着欢乐的火燄，到处閃爍着憤怒的閃电，照耀着那积聚了几百年的愚蠢和錯誤，成見和虛伪的陰云；我們——是在民众的全世界复生的佳节的前夜。（引自“无耻主义”）

預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人民复生的佳节早已經来临。人們改变世界的力量，已經获得充分的証明。而且，先驅者依照自己的理想在从事社会改造时的胜利和成功，好像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灯，給更多的受压迫者标志出求解放的道路。社会正义的太陽，空前猛烈地燃燒起来。人們在原是黑暗和丑惡的土地上，建筑起理想的乐

園。历史开始了全新的一頁。

文学的发展,不待說,依存于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不可分。由于人类的历史巨輪被推上一个新阶段,所以,在文学中也同时激发起一种新浪潮。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文学的胜利。文学从革命接受了新的任务,給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使自己走上了一条新的軌道。

挽歌的时代已經过去,现在是唱贊歌的时代了。

五

現在,我們中国,也已經到了历史的新阶段;我們的作家,也已經到了唱贊歌的时代。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一个作家,如像高尔基所說的,同时担負两种任务——产婆的任务和送葬者的任务。这就是說,一个作家,一方面是唱贊歌的人,但另一方面又是唱挽歌的人。不过,当新的世界已經出現、新的社会秩序已經建立起来的时候,作家們也就有了新的立脚点,送葬者的任务已經有了交卸,从他們嗓子里所发出来的,應該是一种新的声音,新的調子。

虽然新社会的出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战斗的結果;虽然这种战斗,曾經經歷过无尽的艰辛;虽然曙光的来临,是通过充滿血腥的漫漫长夜——虽然是这样,但今天,在人民胜利的日子里,我們的作家,就应该抛开那充滿血腥的黑夜,投身在灿烂的曙光里,面对一切可以贊美和值得贊美的对象,以生活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以无限的欢欣,高唱起我們嘹亮的贊歌。

首先是,新的人物出現了。人,在本質上是屬於社会的,是社会的人,階級的人。在过去旧社会的污池里,处身于非人道的階級压

迫和剝削關係之中，人的性格的美好的一面被掩蔽了，人的世界充滿了丑惡和黑暗。而在解放運動的鼓舞下，人民大眾起來從事於改變社會基礎的工作。在這樣的時候，人們美好的性格，就全部顯示出來，成為耀眼的存在。民族傳統里面優良的質素，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更為完滿地發揮出來。每個人的福利，都正在開始和全社會的福利取得和諧一致。人們性格中最優異的質素，尤其集中地表現於對祖國的熱愛。無論在艱苦卓絕的解放戰爭中，在和平建國的日子里，人們忘我犧牲的美德，勤勞節儉的美德，急公好義的美德，都得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表現的機會。這種新人物的形象，出現在我們作家的面前。對於這樣的人，對於這樣的世界和歷史的創造者，我們的作家，為什麼不應該加以贊頌呢？

同時，由這種新的人物所創造的新的英雄事跡，新的社會秩序，也隨着新的人物的存在，出現在我們作家的面前。正如同在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社會生活曾經這樣豐富多變；在我們的文學歷史上，也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曾經產生過這樣豐富多彩的題材。在解放戰爭中，我們的戰士們，創造了無數驚天動地的奇蹟。我們覺醒了的工人階級，他們在生產建設的熱潮中，編織着異常瑰麗的畫面。我們的革命幹部們，也前仆後繼地投身於那理想的烈火，用血和淚書寫出動人的詩篇。尤其是，在農村社會翻天覆地的改革運動中，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中，我們久受壓迫的農民們，正在創制着震撼世界的故事。我們解放了的婦女，也在社會生活中占據了一個新的位置——對於這一切，對於這一個歷史的新面目，我們的作家，為什麼不應該加以贊頌呢？

而且，隨着新的社會秩序的建立，新的道德觀念也開始建立起來了。人類不斷地否定着過去所建立的一切，因為新的社會給人們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新的關係。人類曾經創造過很多東西，現

在，这一切都随着旧社会的破灭而失去存在的依据。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的建立，要求我们对这种关系的新的看法；又用这种新看法，来巩固和发展人类的新关系——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使生活更加美满，更加合理。对于这种能够和人类的新理想相结合的新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应该加以赞颂呢？

是的，这一切都是应该赞颂的，都是我们作家赞颂的对象。新的人物和新的事迹实在太多、太丰富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唱赞歌的时代了。

六

依然是高尔基在“和青年们的谈话”一文中所说的：

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有反映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各种劳动事实时才会出现。这种现实主义会不会在我国文学中出现呢？当然，它不但会出现，而且必定会出现。因为我国已经具备革命的社会主义创造的事实，这些事实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我们正生活、工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那里，“荣誉、光荣和英勇的事迹”已经成为寻常的事实，连报纸也不能都登载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家们没有注意这些事实，因为他们的注意力仍旧全放在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旧轨道上。这种现实主义“专门”描写“生活的坏现象”，那是自然而且有根据的。

这一段话，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对今天的中国的作家们，也是很重要的。和苏联相比较，我们的社会生活自然还是落后的，但我们已经开始跨上世界文明的最高峰。“荣誉、光荣和英勇的事迹”，也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里普遍产生。我们的作家，应该坚决地离开那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旧轨道，面对我们新的现实，唱出我们新的赞歌。

和唱挽歌的歌手相比较，唱赞歌的歌手自然要幸福得多了。可

欣喜的是，我們已經置身于这样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們應該满怀无比的热情，用自己的工作来反映人民大众的斗争和劳动，表达出人民大众崇高的理想，照明建设新社会的广阔远大的道路。

1950年8月18日，长沙，通泰街

眞 实 和 眞 理

文学的任务和作家的的工作，在眞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所以，关于眞实的问题，也就是，面对着紛紜复杂的生活现象，你怎样才能辨别哪是眞实的，哪是不眞实的？还有，你的辨别所依据的是什么，你持的是什么态度，用的是什麼标准？——这就是每一个作家所必須回答的问题。要是対这样的问题采取迴避的态度，那你就干脆不能写作；要是回答錯了，那你所写出来的作品也就会是不眞实的。只要想一想：連眞实在哪里都不知道，还能写出什麼眞实来呢？

这个问题，使我回忆起一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往事。大概正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們村子里出了一位大人物，他是我远房的堂哥哥，曾經在旧制中学里毕过业，后来又在省城里当宪兵。我記得，他的母亲，我叫她“鑫伯母”的，是一个能說会讲的半老妇人，夏天穿起一件細白麻布短衫，一手揮着一把也是細白的麦秸扇子，这家那家地穿門过戶，打哈哈夸耀自己的兒子。“又寄回一匹滑溜溜的杭紡啦”，她簡直逢人就告訴，还拍打着扇子，“賺大錢啦，有出息呀，出世第三天我就給他算过命的，是个貴人投胎的呵！”不久，那位“貴人”忽然回家乡来了，脚上穿着帶馬刺的叮叮响的黑漆皮靴，腰間挂着一把直拖到地的指揮刀，一身黃呢軍装，走起路

来，胸部挺得笔直，从你面前经过时，会带给你一阵风。于是，几乎有十来天之久，村子里就到处响着鑫伯母的哈哈声，人们都用一种壮羨的神情听她说话。一个在公共厅屋里开杂货铺的堂房叔叔，用他那只很会打算盘的右手摸摸我的头说：“要認真讀書呀，你看潮哥哥多威风呀！”潮哥哥自然就是那位当宪兵的堂房哥哥。可是，同一天晚上，和我同床睡的一个嫡亲的小叔叔——当时他和我父亲已经分家，他是很老实也很穷苦的，后来因为掩护自己的兒子逃壮丁，給反动派抓去关“班房”，結果发了瘋，活活餓死的——却告訴我说：“你呀，讀了书不能去做潮哥哥那样的人呀！莫看他那付衣裳角碰得死人的样子，欺侮旁人算什么本领呢！”当时，我把这两种不同的劝告都听在心里，不过，觉得这个种田地的叔叔的說話，沒有那个开杂货铺的叔叔說話使我受用罢了。可是，好久好久，那位堂房哥哥竟留在村子里，不再回省城里去，却依然穿着那身“令人生畏的老虎皮”（这也是小叔叔說的），橫冲直撞，还把一个孀孀輩的女人霸占了，那个当丈夫的叔叔，因此不得不出門到省城里去卖糯米白糖。等到我进了县城里的初級中学讀書，那堂房哥哥就在县衙門里做起什么書記官来了。有一回，他帶我到他的衙門里去。我坐在他寢室的床上，他却去正堂里拷审“土匪”。因为正堂离寢室很近，从窗口里，我看到他坐在县官旁边，給县官帮腔，大声向跪在案桌前面的“土匪”吆喝。就在这样的吆喝声里，那些几乎剥光了身子的“土匪”（看起来都是些和我們小叔叔一样的粗手笨脚的种田人），被站在兩边的兵爷上夾棍，用藤鞭子抽打得渾身沒有一寸好肉，有的还給血淋淋的吊在半空。总之，那种殘酷的拷打，还有凄慘的嚎叫，使我連心都抖顫起来，只好躲在帳子里面，不敢再看再听。等到拷审完了，堂房哥哥笑嘻嘻地回到房里，一面洗手，一面高高兴兴地說：“你看見‘雁鵝飞’了嗎？就是反身吊得